

#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当代中国的 文化与社会意义

龚重林

(四川理工学院 法学院,四川 自贡 643000)

**摘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四个全面”中重要的战略举措,通过对于“小康社会与现代化”、“小康社会与中产阶级文化”、“小康社会与创新文化”三个层面的阐述,可以说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于中国当代社会与文化方面的可能影响与促进作用。中国面临全球化的各种冲击与影响,必须参考其他社会与文化的历史经验,并从中总结出适于自己的发展路线。特别是对于来自西方启蒙传统的反思精神、市民社会的开放性、中产阶级文化的进取性与创造能力,尤需进行兼容并蓄的吸收与改造,以促成当代中国新一代公民文化的茁壮与开花结果,从而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先进性与优越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包括了外在的建设,又包含内在意识的改变过程,它由客观物质环境的改变开始,进而对人的社会与文化生活产生影响。不存在着一个绝对化的中产阶级社会与文化,这只能是在中国未来建成的小康社会的历史实践基础上改造而成的东西,基于概念使用上的方便,它被作为一种类比式的运用。在这一进程中,除了自下而上的物质与文化建设,还必须自上而下的正确指引,这就是党的领导所起的关键作用,通过如此辩证的结合,所勾勒出来的,正是一幅未来中国公民社会的美丽图景。

**关键词:**四个全面;小康社会;中产阶级文化;创新文化

**中图分类号:**D26;C9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80(2015)04-0023-11

党的十六大报告从经济、政治、文化、可持续发展方面界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内容,特别将可持续性发展能力的要求包含在其中。具体就是六个“更加”:“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十八大更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

2014年11月,习近平到福建考察时提出了“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

---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重点研究基地项目(JCSF2015-13)

**作者简介:**龚重林,博士,讲师(E-mail:forestkung@163.com)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三个全面”，2014年12月在江苏调研时则将“三个全面”上升到了“四个全面”，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新增了“全面从严治党”。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到，“四个全面”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地位<sup>①</sup>。<sup>[1]</sup>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经过一个建设的阶段，而建设是有具体指标的，达成这些指标，不仅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背后的深刻社会与文化意义，更值得探索与深思。笔者认为，在全球化竞争的时代，小康社会的建设与全面完成，与建构具有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社会与文化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科研产业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新创意、新观念、新思想等等所谓的文化软实力的发展都需要这片小康社会所创造出来的沃土，才能滋长茁壮，乃至开花结果。而这个目标的实现，也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先进性与优越性历久而弥新的最佳证明，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 一、小康社会与现代化

政府部门和国内专家学者们按照国际通用的标准，并参酌国情，订定出一些关于建设小康社会的指标，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李善同、孙志燕、冯杰于2004年3月12日在《经济参考报》所共同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包括经济、社会、环境和制度四个方面的16项指标（以2020年为准）<sup>②</sup>，其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我国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可望达到60%以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万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8000元；恩格尔系数低于40%；社会基本保险覆盖率达到100%；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应达到10年；预期寿命可达到75岁；文教体卫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可达到10%；城乡居民的安全卫生水普及率应达到100%等等。政府根据自身客观状况对未来发展进行预测，设立可操作的目标，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调整以趋近之。除了政策的现实意义之外，我们也要看到，在其中所被赋予的某种区别于前现代的“发展和进步意识”，接下来，就“体制的反身性”和“自我适应性”来说明此一现代性的意识。

### （一）体制的现代性

回头看西方的历史，从16世纪到19世纪三百年间的西欧社会，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也产生了史无前例的动荡，在整个西欧范围爆发了无数的农民、工人起义与革命。一直到19世纪末，西方政府开始制订改善这些问题的政策或方案，此类社会政策或法令的制订，其目的无非在使一般人能够在生活上得到最基本的保障，以缓和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例如丹麦在1891年开始实施“养老年金计划”、德国在19世纪末实施“社会保障三法”，英国则从16世纪时就有所谓“济贫法”，1906年开始制订一系列社会福利与保险政策，1946年通过“国民保险法”，宣布建成福利国家措施。对于他们的实施成效，一般可从政府定期公布的社会与经济指标中得到概观的印象（例如普查），其中诸如平均寿命、婴幼儿每千人死亡率、每千人病床数和医师数、识字率、每千人拥有车辆数、家户平均可支配收入、城市化比率、平均每人居住面积、下水道比率、公共交通设施比率等等。透过这些指标，既可以掌握其社会生活的状况，也可以作为进一步立法改善的依据，这是一种随时根据自身状态的理解，提出相关对策，不断向前发

展、改善现状的企图,可以看成是启蒙时代以来进步精神在体制上的反映,用安东尼·吉登斯的话说,此系现代性之“反身性(reflexiveness)”<sup>③</sup>在社会与政治领域的展现。

## (二)自我保护与适应性

以上这些做法,基本上有一个大的背景,它们是与资本主义的兴盛和随之产生的社会问题分不开的,一方面,由于大量的财富被少数人垄断,多数人贫无立锥,导致社会动荡不断,因之政府采取了改良性的社会福利与社会安全政策,以缓和既有的矛盾与冲突;另一方面,启蒙精神的广泛接受与一般民众权利意识觉醒对于普选与民主化的追求,也使权力合法性的危机得以纾解。也就是说,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缓和了社会自身被资本主义政治力与经济力无限压榨的恶劣状况,另一方面使资本的积累方式踏上一个新的台阶。在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这是一个被社会学家称之为“现代化”的阶段,换言之,它主要指的是从工业革命以后,西欧所经历一连串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巨大变化。一般而言,它指涉了政治上实行普选民主制,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社会生活进行自我调整与自我保障能力增加,文化和价值越趋多元与开放的总体趋势。

若以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例,达成这些指标<sup>④</sup>,既可一定程度上化解发展与公平的矛盾,突破既有的发展瓶颈,并进而达成社会富裕与和谐的双重目的,同时也显示出,作为一种测度,指标是体制藉以反观自身以求进步之“反身性”,是现代性在思维上和体制上最显著的一个特征。而可见的未来,中国的发展将进一步迈入现代化的中后期阶段,预计在本世纪中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程度。随著经济的发达,社会生活水平全面的提高,兼以中国的都市化程度日益上升(2014年有54.77%的人口住在都市,估计2050年超过70%)<sup>⑤</sup>,<sup>[2]</sup>城市生活中出现某种类比于西方的“中产阶级群体”<sup>⑥</sup>,应也不令人意外。虽然中西方历史发展不同,但现代都市生活许多可能的共性是存在的,而在这之上发展出来的“中产阶级文化”,便是其中的一种。这种文化形态,与西方社会在各方面的不断创新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一种类比,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哪些借鉴呢?接下来将讨论这个问题。

## 二、小康社会与中产阶级文化

城市是一个汇集各方人马,充斥着来自许多不同地区的生活特征的地方,举凡大规模文化传播、碰撞、汇聚的地方,必定是人类文明最亮眼之处,尤其是大型的跨国商业城市,诸如中古世纪的长安、伊斯坦堡、耶路撒冷、亚力山大,十四五世纪的马德里、里斯本,十六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十八九世纪的伦敦,二十世纪的纽约,都是如此。

### (一)城邦的自由与活力

西方的民主政治起源于希腊的雅典,而雅典正是一个海港都市,汇集了地中海文明的精华于一身。雅典既是一个城邦国家,也是一个商业贸易的都市,跟不同的人做生意,不是作战征服,商人们必须折冲协调,而非诉诸单纯暴力,重点是交易的利益,而此利益必须以计算和妥协为前提,这就铸造出一种以协商、讨论为基础的社会氛围。这种重协商与参与的精神,一直以来都是西方政治生活的一个特色,即所谓“城邦政治”之谓也(politeia)。计算、讨论、协商,乃至执行契约,需要的是理性与法治,两者都预设了相当程度的精神与文化素养。一群暴民是

不能讨论什么的,因为他们易受到激情的影响,无能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与负责的行为,就像亚里士多德所指出<sup>⑦</sup>,暴民民主容易走向民粹与不理性,在他心目中,共和制(polity)无疑是较好的,而后的主体是有适度财产和才智的人,用现代术语来说,中产阶级差堪比拟之。

中国古语亦云:“有恒产者有恒心”。当一个社会有相当多数量的人都能过上相对比较富裕的生活(即在温饱之上的水平),社会处于安定繁荣的局面,它才有足够的资源支持某些特定的群体专门致力于文学、音乐、绘画、体育、科学及广义的各种专门知识。举例来说,欧洲的大学,一般都在城市,例如牛津、剑桥、海德堡、维也纳、巴塞隆纳、巴黎、鲁汶等大学。中古世纪以来,西方知识殿堂的营造,与城市的财富积累和权势者的庇护是密切相关的,对思想自由的容忍,富人或政府(或教会)愿意出资建立大学,使得一群致力于追求知识的学者,可以在此地安心研究,这些大学所在的城市,因此有着相对开放与进步的气息。从16世纪到20世纪前期,举凡人类科学上的重要发现与贡献,十之八九都出自于上述城市的几所大学。

欧洲城市不但有著名大学,更有着与此一知识生产基地匹配的各种社会环境,例如发达的出版业、普及的教育、广泛的好奇心与追求新知的社会风尚,城市中随处可见书店与图书馆,咖啡馆和小酒馆中充斥着热衷于讨论各类事物的不同人群。除了教室和课堂,后两个地方往往扮演了更为广泛、深入的知识汇聚讨论之处(不限于知识份子,一般民众也参与)。过去两百年,在欧洲各地城市这些大学里,在街巷中大大小小的咖啡馆、酒馆里,文学家、思想家、科学家们彼此相互辩难、攻讦,碰撞出各式各样的火花,从而酝酿出他们超越前人的观念突破与伟大构想<sup>⑧</sup>。

梵高、高更、塞尚、林布兰特、毕加索、达利,这些名字与巴黎、阿姆斯特丹、马德里、维也纳诸城市是分不开的,而狄更斯、王尔德、叶慈、大小仲马、华尔华兹、沙特、左拉、卡夫卡,他们作品的背景也有许多源于各自所在的城市。这些人里面,有些是激进的革命派、有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同性恋,政治流亡者,乃至言行常有惊人之举者,但都不影响他们在其所处的城市中尽其所能地发挥其创作与赢得社会上广泛的名声,甚至一些权贵也特意的予以庇护或赞助。

欧洲城市中各式各样余暇活动或嗜好喜爱者自行组织起来的团体,也是进一步促成精致文化蓬勃发展的推手。以音乐与戏剧为例,这些活动的盛行,并非全是王公贵族的赞助,假日的公园与市集里不乏民众们自发的定期演奏与表演。社会本就存在著如此多的爱好者与欣赏者,音乐与戏剧的公演从来不缺买票的观众,可以说,这是一个自下而上,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兴趣所在,并且参与到这些爱好与活动之中的生活共同体。试想,没有与其匹配的物质条件,没有一定积累的精神文化与智识传统乃至社会共同信守的基本价值与规约,一个匮乏贫困,愚昧无知的社会是做不到这些事的。这种有钱、有闲,且乐于从事工作以外的种种余暇活动的人群,他们的风尚与行为模式,在西方一般用“布尔乔亚文化(Bourgeoisie culture)”称之,此与中产阶级文化几乎是同义词,某种程度来说,也是精致文化和流行的代名词。诸如服装时尚、运动、音乐、戏剧、文学、绘画、乃至咖啡馆文化、各种沙龙活动,跟这个群体的品味或喜好的带动有很大关连<sup>⑨</sup>。

## (二)城邦生活中的主体

以“有产者公民”为主的现代中产阶级社会,不仅是上述种种文化表征的培养皿,它还承

载了现代西方所公认的、约定俗成的基本价值观,诸如契约精神、公平竞争、自由与民主等等,并在日常生活的各种非正式活动中再生产这些价值观与规范,这正是德国当代大思想家哈伯玛斯在其《沟通行动理论》和《公共领域之转变》书中所论及,所谓市民社会之“公共领域”对于建构当代政治与社会规范性和合法性基础的作用。可以说,一个以现代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相对而言比较具备一种自我稳定、自我纠错的能力,盖因不走极端,遇事相对理性审慎,重协商,不尚独断,倾向一种顾及各方利益,中庸均衡的处理方式。当整个社会都处于这种氛围中,发生严重利益倾轧和不平等压迫的机会较小,社会与政治的动荡自然较不易产生。特别是19世纪以来西方各国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措施的实施,兼以其不断的完善化,往昔常见的严重社会动荡与革命起义已不复多见。

### (三)一个合逻辑的预期:中国新一代公民阶层

随著中国不断融入全球化与本身都市化进程的加快,兼以各项生活指标都达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水平之后,中国的城市中也产生一个相当数量的、类似西方当代的中产阶级的人群。这群人有中上的收入,受过大学以上的教育,基本上从事各类专门的行业,有许多人并且属于中级以上的管理阶层。以2020年为参照点,这些人多半在八零后出生,正值中壮年,他们经历了改革开放后的成果,亲身感受到全球化的冲击,受过更好的教育,比他们的父祖辈更了解自己与世界。这些中国新一代的“有恒产者”,对文化、社会等事务也可能会投入更多的关注。可以合理预测,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许会在假日观赏音乐会、戏剧表演、各种职业运动,乃至参与各类志愿者组织,而各种活动或喜好的业余者俱乐部或会越来越多,他们在讲究生活的舒适之余,逐渐地开始讲究其品味,或许在某种意义上也会形成类似西方的中产阶级群体和附随其上的精致文化。而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从西方的经验来看,确实有利于文化、科学、艺术的创新与发展,下面将对其可能性进行论述。

## 三、从“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到创新文化的沃土

前面提到,按照现代社会的发展经验来看,当一个社会中许多人成为有产者,这一群人的需求肯定不会只停留在“温饱”的水平,除了对物质生活(食衣住行)更上一层楼的要求外,也必定开始留心精神生活上的提升。同时,在中国,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受到市场经济与全球化的影响可谓最大,竞争的要求使得这个群体必须对新事物、新知识保持关注,所以连带地,会促使他们主动地投入更多资源在教育上。精神生活的追求包括价值、知识、美感、乃至信仰等层面,而这些追求又与人的素质本身有关,一个只以吃喝拉撒为满足的人,是谈不上什么精神生活的。一个有能力、有意愿提升精神生活的人,既不可能出现在一堆贫穷的文盲中,也不会出现在一群土豪暴发户之中,而只可能出现在一个普遍受过高等教育、有着适当的财富,生活上不虞匮乏、了解知识与竞争对于生存的重要性,并且对于世界与异文化抱持着开放与学习心态的群体之中。

### (一)创新:量变到质变

我们常说不管推动什么事都要注意群众基础,可以假想,如果傅科和德勒兹的书,在中国一刷再刷,卖上十几个版次,康德全集的全译本在中国出齐了,每几年都可以再版,这代表什

么？这表示社会上有一个数量的人群，对这些思想持续投注以相当的精力，有哪些“群众基础”在支撑这个现象呢？很显然，这些群众应该跟大学的关系密切，他们或者是大学里的研究者、教师、学生或一般受过高等教育，出于知识上的兴趣而关注的人。如果这个数量不是几万，而是几十万，假以时日，有很大可能在这个领域里出现几百个优秀的康德研究者，再进一步想，从这几百上千当中，出现几个世界级的专家，甚至这方面顶级的思想家，也是比较符合常理的发展。可以设想，能维持这么一大群爱好思想的人的社会，必定是各级教育蓬勃发展，各项生活指标都有一定水平的相对富裕社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标推动下，中国的图书出版量、大学入学率、大学的数量与科研经费，都处于不断增加的势头，中国与外界各方面的交流更为频繁地进行，凡此种种，对于增加上述的“群众基础”来说，无疑起着很好的促进作用。

再以流行文化为例，麦可·杰克森、麦当娜、滚石、巴布·迪伦……作为一个个流行音乐的世界级天王巨星，和其背后强大的流行工业(fashion industry)是分不开的，而这个产业又是以美国社会中产阶级的消费和娱乐文化为其基础发展起来，随着美国国力和影响力的扩张，进而伸展到全球。可见不论是科学、思想或流行文化，欲求其发达，都要经过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达到质变的临界条件必以积累深厚的新一代公民文化(或所谓中产阶级文化)的群众基础为其前提，观念与思想创新就从这里冒出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无疑地，中产阶级文化的发展与成长，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命题推动下，也是一个可以期待的、合逻辑的发展结果。

## (二)思想的解放

城市与中产阶级文化，不仅促进了物质生活的跃升，同时也使人们有余裕从事各种文化事业的追求。思想是文化的根，而文化活动则是思想指导下在社会所结的果。西方的经验显示，一个社会的各种思想越是活跃，其文化事业(各种艺术创作、文学、音乐、乃至更往下的电影、电视、时尚流行等所谓文创事业)必定也随之蓬勃发展。而社会中如果存在着许多关注各种思想发展的人，则表示某种鼓励“反思”的文化气氛的存在，这就预设了一个对于独立思考和自由探索而采取相对宽容态度的社会与政治环境。从人类历史看，重大的科学发现和思想上的创见，更多地出现在这样的环境底下，没有这些重大的基本发现和创见，很难想象之后一系列在科技、产业乃至在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重大革新与突破。要解放思想，要先解放思想的环境，有了这样的条件，往下才会有各式各样积极活跃的文化事业，假以时日，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积累出令人印象深刻、对世界真正有影响力、并具创造性的“文化软实力”。而中国未来在相似的客观条件下，也有可能出现某种适应于中国国情的、一定程度类比于西方的中产阶级文化，这对于自由探索、独立思考，从而创造真正文化软实力方面无疑是有助益的<sup>⑥</sup>。

如果教育传统中缺乏鼓励探索与质疑的精神，社会对冒险与创造性事业的价值不感兴趣，那么人的思想肯定不活泼，人的主动进取精神势必被消磨。听指挥、按规矩办事本身并不是坏事，任何事业要有进展都须如此，但是这主要是在某些前提、纲领、方法都已经确定的情况下而为之，更多地牵涉到执行层面。但在精神和文化领域，尤其是艺术与文学、哲学等领域，比较无关乎执行，而是与“时代精神(zeitgeist)”及“世界观(weltanschauung)”诸前提的创造有关。我们不能用攻山头、下命令的方式炮制出普希金、巴尔扎克乃至雨果，也没有什么既定的

政策或方针可以为我们造就出马克思、胡赛尔或海德格。文学家和思想家,他们特别需要想象力和“敢于思考(Sapere aude)”<sup>⑩</sup>完成他们的事业,一个能够让他们释放想象力和敢于思考的社会便是其存在的客观条件。

没有思想指引,行动有如无舵之船,而思想要因应时代,推陈出新,否则便会如汤恩比在其《历史研究》所指出<sup>⑪</sup>,不能回应历史给予的挑战,强大如古罗马或波斯,最终还是走上灭亡的道路。“安土重迁、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时代,不需要创新,只需要不折腾地安生过日子,既没有列强入侵,也没有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所说的“此三千余年来一大变局也”。然而近代的经济全球化与帝国主义发展,让中国无处可走,无路可逃:只有面对,只有拼命迎上前去。危机与挑战锻炼求变与创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便是这种环境下的产物。没有危机与挑战,便没有思想创新的必要,而全球化的经济与政治,是此刻中国所面临最大的挑战,中国必须找出自己的出路,这就首先要求中国人“敢于思考”。思考是一种全有全无的境界,既是思考,就不能给自己设限,否则犹如不思考,不思考,势必找不到出路。这是西方启蒙精神的核心,也是随后而来西方文化全面绽放、开花结果的根本原因之一。

岂止人文领域,科学研究强调的“怀疑精神(skepticism)”、“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和敢于思考的启蒙精神,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犹如笛卡儿在《方法导论》中所强调,思考的起点是对一切成见与不可靠的意见置疑,直至我的怀疑本身,乃不可怀疑。怀疑乃是方法的怀疑,不是怀疑一切到底,从这里开始,一点一点地还原内外在世界,直至形成确定的知识体系。在科学中,一切命题在没有经过实验证明之前,都是存疑的,在人文社会的领域,只有透过经验的不断摸索与实践才是一切政治社会主张的试金石。一个社会能同时出现牛顿、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休谟、洛克和亚当斯密决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在年轻的比尔·盖兹(Bill Gates)、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敢于挑战既成产业体系、创造新型企业范式的地方,出现贝尔实验室、硅谷、阿波罗登月计划就不是什么令人意外的事情。达尔文并没有因为《物种原始》一书而被砍头,马克思被自己的母国驱逐后,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首都完成了《资本论》。对怀疑和反思精神的宽容和鼓励是一个伟大文明和国家的标志。中国将建成的小康社会,应该秉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态度,取法这种蓬勃发展于西方市民社会和中产阶级文化之中的反思与怀疑精神,并将之塑造成中国新一代公民的文明面貌,我们不怕眼前落后,就怕不知进取,不担心有多少问题,只怕不愿意面对解决。从西方经验看,中产阶级文化、市民社会中所涵摄的反思精神,正是产生这些积极作为的先决条件,我们应该在教育和各种社会实践中鼓励和培养这样的文化和气氛。当然,这绝非是一件易事,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and 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五四的民主与科学新文化精神,犹未远矣,一定程度讲,我们早已在这一条路上,不是要不要,而是如何做得更好,做得更彻底,这是本民族的共同责任与命运,无可回避。

### (三) 小康社会与软实力的共同成长

提升文化软实力是近年来一个热门话题。文化软实力的基础不是什么别的,它是一个建立在“敢于思考”价值取向上的社会所造就的结果。伟大的文学创作、艺术创作不可能来自思想的真空。缺少宽松的思想环境,处处充斥着不当的禁忌和限制,缺乏社会中相当数量的群体对于文化事业的爱好与主动参与,凭何奢谈软实力? 钱很重要,但光是砸钱,没有潜心积累、营

造软实力成长所必须的社会文化土壤,仍是归于空谈。诺贝尔奖、科技创新、产业转型、乃至冲奥,从文学、艺术到流行时尚工业的创意,中国这些方面要再上一个台阶,不单纯是 GDP 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观念的改变,而最难的,恰恰是观念的转变,这将会是一个伴随着中国小康社会一起成长的过程,责任虽艰巨,但无论如何,不至于需要另一个一百年来完成它。

当中国的教育与文化事业继续蓬勃发展,制造业、服务业占有 GDP 多数份额,高度城市化、城乡差距缩小到相当程度,基尼系数控制在良好范围,以西方的经验类比,有可能会形成一个以各种专业取向和管理人才为主的,类似西方中产阶级的群体。可以合理预见,这类中国新一代的公民对于全球化之下来自世界各地竞争的高度挑战,将会比他们先辈具有更深刻的认识和敏感度,而吸收新知识和探索新事物的能力,则攸关其生存与福祉。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资本主义和新教伦理之间具有一种“选择性的亲和力”<sup>⑩</sup>,从一种类比的意义上来说,中产阶级的经济与社会基础和崇尚自由探索、独立思考的文化气氛之间显然也存在相似的关系。透过几代人的辛勤灌溉,从中国的小康社会发展所促成的新一代公民文化的土壤中结出类似的果实,将是可以期待的。

#### 四、结 论

前面提到,随着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可能出现一个类比于西方的中产阶级群体,随着中国经济的飞跃而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会得到进一步发展,以西方的经验来看,这个群体一般受过比较好的教育,有适当的收入,在行为和思想上较审慎,不喜欢过激的事物,重协调与协商,但却有着关注新事物与追求新知的秉性。一方面,西方中产阶级社会中的某些元素,有助于经济竞争力和文化创新的追求,应该予以鼓励和促进;但是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有可能自其中所出的、并不全然适合中国当下环境的政治主张或趋向,必须带着审慎存疑的态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固然是关键的战略目标,到 2020 年,中国就会进入到实现这个目标的阶段,但是其他三个全面也都是不能缺少的: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深化改革,社会才有活力,依法治国,社会生活能够有序进行,和谐稳定,从严治党,发挥带头的作用。在这其中,党的领导处于一个最重要的位置。毕竟,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是基本原则。我们有我们的国情,固然要学习外来的东西,但是根本的东西必须是自己。

现代化过程,有西欧模式,也有苏联和日本模式,有自下而上的慢慢成长茁壮(前者),也有用霹雳手段自上而下在短期内达到目标(后者)。这两种模式,都各自有其优缺点,但最重要的是,没有人能够教中国该如何走这条路。一百多年来,我们经过种种尝试,最终采用了社会主义,而这是一种带有中国特色和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制度。同样地,中国的现代化,也必然是一条靠自己走出来的路,不但要借鉴自下而上的许多好方法,也要注意自上而下的指导和牵引。

本文讨论的焦点,比较多地放在自下而上的部分,亦即具有中国特色的、类似于西方中产阶级的群体是随着社会经济与生产力发展提高而出现的事物,文化创新的现象常出自于这一阶层。然而,不能忽略这这也是一个辩证的循环,此阶层的健康发展,又会反过来引导、牵引小康



社会中其他阶层的全面提升,有如水之就下,一层层的渗透,一步步地往下涵化,小康社会的发展促进中国特色的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后者反过来巩固小康社会。“四个全面”,既是自下而上的逐渐积累(自底层焕发的经济与社会力),又是自上而下的正确指引(党的领导)。这两个方向的互补和有机结合,将在中产阶级文化和小康社会的相互辩证之中得到最佳体现。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改革没有既成的范例,需要调动思想的主体性、积极性和创造力来替自己开路。我们虽有自己的特点,但并不代表排斥别人经过实践验证过的好东西,“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本就是中国文化的传统。而“衣食足则知荣辱,仓廩实则知礼节”,富而有礼,富而好礼,这是人性最基本的道理,并不因中西体制、思想不同而有所差别。必须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一个简单而深刻的真理。在发展过程中,一些不符合时代需要或有碍发展与改革的思维模式或做法都需要深入检讨,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扬弃落后的因素,提高自身的觉悟与促进现实的不断改革进步。“四个全面”既融合了我国固有的优良文化,充分考量我国的国情,又能够针对西方的优点有鉴别地加以吸收,这种不断自我调整与改善自身以臻完善的能力,确实符合“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精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是有别于西方的,属于中国特有的一条现代化发展路线,又不失时机地掌握住世界的发展潮流。它难免在一定程度上触及社会与文化的变革问题,而诚如上文所分析,此与类似于西方“中产阶级”的阶层属性有所关连,也是全球化过程中不同文化、社会与经济彼此碰撞与互相影响的结果。虽然国内外已有研究显示出此一群体的某些特征出现在中国的城市社会中,但这更多地是一种与西方中产阶级的类比,至于它的确实内容,肯定不会是后者的翻版。我们所预期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既具有某些西方中产阶级社会的特征,也必定会烙印上自己的标记。无须斤斤计较于它的能指(signifier),重要的是它的所指(signified)为何,后者的内容是被具体历史实践所决定,而非被某些形而上的超越范畴(将西方中产阶级的概念予以绝对化或其某些价值观不加区别地抽象化与普世化即属此类)所决定。社会主义的先进性并不仅仅在于我们说了什么,而更表现在于我们做了什么,在说与做的辩证结合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后,需要指出,“反身性”,是现代化的重要特质,而反身性与实践是分不开的,对于它在西方公民社会中的许多体现,特别是“反思精神”这一项,急需有鉴别地加以学习和推动。秉持着这样的审慎态度与进取精神,结合党的领导和“四个全面”的充分指引与带动,必定能够建造出具有自己特色,一定程度上既区别于西方,又带有后者某些优点的中国公民社会与文化,并且在推进经济发展和文化软实力方面都能创造出一番新局,如此不仅证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明的先进性,也必将继续为国家与民族的雄飞创造更好的条件。

#### 注释:

①参见胡鞍钢在中国青年网的一篇评论,其中集中讨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四个全面”的龙头的重要性。

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十一五”计划基本思路研究课题组,李善同、侯永志、孙志燕等人指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的十六项指标”,若无特别说明,本文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指标率皆以此为参照。李善同,侯永志,孙志燕,等.详细解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

体系的 16 项指标[N].经济参考报,2004-03-12.

③符应于哲学上笛卡儿“我思(cogito)”的反身性,有所谓“体制性的反身性”,例如商业风险评估和国家各项普查事业,风险社会(risk society)和评估预测(evaluation and prediction)是其中的特征,参见 Anthony Giddens 有关反身性(reflexiveness)的讨论,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1990。

④虽然不同部门或专家学者所强调的重点略有不同,但一般而言,注 2 中的各项指标仍可作为适合的参考。

⑤中国的城市化率正在不断提高之中,未来可望进入城市生活为核心的时代。参见百度百科:中国的城市化率。另见“国家统计局:2014 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 54.77%”,[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501/20/t20150120\\_4386891.shtml](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501/20/t20150120_4386891.shtml),2015 年 1 月 20 日,中国经济网。

⑥近年来已有许多国内外学者对有关中国中产阶级的特性及其产生的作用进行研究,都指出了中产阶级这一群体特征的存在。H·D·斯蒂芬尼,郑怡,罗如春.中国中产阶级文化认同的培育[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81-86;温铁军.中国中产阶级崛起的社会影响[J].决策探索,2013,(2):22-39;郁方.中国的中产阶级与他们的消费文化[J].新经济杂志,2005,(3):19-31;刘红.中西方的中产阶级理论比较及启示[J].江海纵横,2006,(2):74-87。

⑦亚里士多德区分不同政体,并指出其正义的与不正义的类别,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13。

⑧张耀在《打开咖啡馆的门》一书中对西欧社会咖啡文化及其起源做了阐述,并将之关连到中产阶级文化的发展。张耀.打开咖啡馆的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65-67。

⑨参见 Thorstein Veblen 有关余暇阶级的生活风格及其批判(The Theory of Leisure Class,1994)。

⑩康德在文中强调,人从蒙昧无知的状态中醒来,不再被权威、迷信所限制,敢于站在自己理性基础上独立思考,易言之,此即启蒙之谓也。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77-78。

⑪汤恩比认为,在少数有创造力的精英领导下成功回应挑战,文明便兴起。文明在精英阶层停止创造性回应时衰退,后因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及少数专制的暴政而沦丧。阿诺德.汤恩比.历史研究:上下册[M].陈晓林,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78:440-481。

⑫马克思·韦伯借用此一化学名词来说明文化与行为动机之间的关联性。马克思·韦伯.韦伯作品集[M].康乐,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7-8。

## 参考文献:

[1] 胡鞍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四个全面”的龙头[EB/OL].中国青年网,(2015-03-04)[2015-06-02].[http://news.youth.cn/wztt/201503/t20150304\\_6503183.htm](http://news.youth.cn/wztt/201503/t20150304_6503183.htm).

[2] 中国的城市化率[EB/OL].百度百科,(2012-10-31)[2015-05-30].<http://baike.baidu.com/link?url=hEGNke7yDENdnIYtkl432VTew6xGq3paMOflpCpfw1RiWIGcPPVDLF6L1P7-2vDwcKHrUT02x7k7-PrUnHXgK>.

责任编辑:陈于后

#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of “Comprehensively Setting up a Well-off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GONG Chonglin

(Law School, 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Engineering, Zigong 643000, China)

**Abstract:** “Comprehensively Setting up a Well-off Society”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initiative in the Four Comprehensives.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a well-off society and modernization”, “a well-off society and the middle class culture” and “a well-off society and culture of innovation”, the possible impact and promoting function of comprehensively setting up a well-off society on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culture in China can be explained. China is facing various impact and influence of globalization and it must refer to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other societies and cultures and sums up the route suitable for its own development. Especially for the reflec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western enlightenment spirit, the openness of the civil society, and the progressiveness and creative ability of middle class culture, China needs the inclusive absorption and transformation to promote the growth and blossom of a new generation of civic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reveal the advance and superiority of socialism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mprehensively Setting up a Well-off Society” both includes the external construction and the change process of inner consciousness. It begins with the change of the objective physical environment and further impacts on the human social and cultural life. There is no absolute middle class society and culture. It will be a matter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practice of comprehensively setting up a well-off society in the future. For the convenience of using the concept, it is used as a kind of analog. In this process, in addition to the "bottom-up" material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there must also have the “top-down” right guidance, which is the key function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Through such a dialectical combination, sketch is a picture of the beautiful landscape of civil society in the future of China.

**Key words:** Four Comprehensives; well-off Chinese society; middle-class culture; innovation culture